

November 2012

The Ethical Landscap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ty in Shen Congwen's *Border Town* and After

Yan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 Yan. 2012. "The Ethical Landscap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ty in Shen Congwen's *Border Town* and After."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6): pp.134-14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6/1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边城》及其之后：现代性转变中的伦理图景

——以《边城》、《长河》、《雪晴》系列为中心

陈彦

摘要：1934年之后，沈从文的湘西书写从传奇故事转而为历史面向的经验展开，把人物活动镶嵌于历史性的“经验影片”中，以细致呈现湘西古老社区生活面临的现代转变，而这转变不仅见诸于心理、观念层面的现代惊奇与眩惑，更深刻表现在地区权力关系和道德秩序面临的冲突与危机，以此形成有别于传统的伦理图景。虽然湘西书写中现代城市文明批判的心理、观念主题还在，但是因为触及到地区生活和权力关系变化的经验深层，《边城》及其之后湘西书写的伦理指向，显然和沈从文更为深刻的现实关切相联系，那就是湘西将向何处去？中国将向何处去？

关键词：湘西书写 经验影片 社区生活 权力关系

作者简介：陈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候选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主要从事京派文学与文化、西南联大诗歌与小说、以及德语文学研究。电子邮箱：sansan24@sina.com

Title: The Ethical Landscap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ty in Shen Congwen's *Border Town* and After

Abstract: Shen Congwen's writing of Xiangxi (the Western Hunan area) shifts its focus from legendary stories to history – directed experiences. The activities of his characters are put into the mosaic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s, so as to present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community life in the Western Hunan area. This transformation shows not only as the wonder and amazement in the psychological and conceptual dimensions but also as conflicts and crises in the power relations and moral order, as well as the resultant formation of an ethical landscap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Although the criticism of modern urban civilization remains, the ethical concerns in Shen Congwen's writing of Xiangxi in and after *The Border Town* are more directed at the question of where Xiangxi, and by extension, China, is going to. The paper claims that this turn in Shen's writing of Xiangxi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his concerns about the reality.

Key words: the writing of Xiangxi (The Western Hunan area) mosaic of experience community life power relations

Author: Chen Y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urrently a Ph. D. candidate a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the Beijing – school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oetry and fiction of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German literature. Email: sansan24@sina.com

引言

1934年，以《边城》为界，沈从文的湘西书写发生本质的转变。在此之前，沈从文一直从传奇性的故事叙写中提取价值与意义。那里的乡村仿佛一只自明的道德容器，写作者信手拈来的人物与故事，就足以寄托乡思，表达与现代城市文明的疏离，批判它对人性的腐蚀。但是，1934年之后，沈从文的湘西书写突变为历史性的经验展开，从《边城》（1934），到《长河》（1938—1945），以及《雪晴》系列（1945—1947），人物心理与行为全都转而在一种

历史性的“经验影片”上进行。所谓“经验影片”，是指人物活动的背景或历史环境，主要表现为风俗、习惯以及地区权力关系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边城》之前的传奇故事中也有风俗习惯描写，但是恰恰是在《边城》之后，此前指引人物行为的标准与规则，也就是所谓的“道德”，恰如19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那样，突然以这个词语的源初意义显现出来——作为一整套在地区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与习惯，“它能够像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餐桌礼仪那样轻易地被改换”（阿伦特，“责任与判断”40）。

《边城》及其之后，从传奇故事转到到历史面向的经验呈现，沈从文以一种人类学式的深描笔法，细致呈现湘西地区古老社区生活面临的现代性转变。传统社区生活

中,面对残酷自然力与潜在的外来者威胁,长久相互依存而形成的自主性与自足性,以及与此伴生的农业文明时代的“神—人”权力谱系动摇了,“家边人”守望相助的桑梓情感已不足以维护社区的有机联系。这些转变不仅见诸于心理、观念层面的现代惊奇与眩惑,更深刻表现在地区权力关系和道德秩序面临的冲突与危机。要之,现代性的深入内卷,不仅是现代工商文明生产、生活方式与传统农商文明生产、生活方式的冲突,更有现代政制权力结构对于传统社区权力谱系的重构与渗入,自主、自足的传统社区被强制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制结构(钱端升649);然而,这一切又都叠合于“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所强化的国族情感与民族国家认同之中。出于对上述复杂社会历史经验的洞察,《边城》及其之后,沈从文无法再把湘西引为充满活力的道德源泉,以之构建他的现代城市文明批判;相反,他开始倾注于湘西现代性转变中的心理症候,并且揭示地区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及它对湘西地方未来生活的可能影响,由此深描细绘出一幅中国传统社区在其现代性转变中充满动荡、冲突与不安的伦理图景。

诚哉斯言,“一切稳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湘西将向何处去?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一切,都与沈从文“国家重造”、“民族品德重造”问题的政治关切紧密联系。但是,对于上述沈从文湘西书写的伦理描绘,已有研究并未给予充分探讨与分析。在此,本文试结合《边城》、《长河》与《雪晴》系列文本对上述问题做一番新的检视。或许,正能够如沈从文所说,湘西一个地方的问题,也是全国各个地方的问题;而历史上一个时期的问题,也能够成为当下现实问题的借镜。

一、《边城》与传统社区社会生活结构

《边城》作为沈从文“湘西书写”的经典文本,一向为研究者所看重。研究者注意到《边城》在传统中国形象构建上所具有的典范意义,它的牧歌情调与叙事形态的美学价值,都得到研究者非常深入的提炼与探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沈从文“湘西书写”的历史转向中,关于《边城》,就其文本构建方式而言,写作者已经从倾注于个人心理与行为的传奇式描写,添加进新的经验内容,那就是对乡村道德秩序与伦理关系的景片描绘。但是,这一变化在沈从文湘西书写中的转折性意义,却为研究者忽略不察,而我们可以通过《三三》(1931)与《边城》(1934)的对比来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从人物心理与故事来看,《边城》几乎是《三三》的复写,这也是具有内省倾向的沈从文小说一向关切的主题:作为一种时间性存在,生命个体的成长与变化造就特定的心理状况与人生处境。三三与翠翠是年龄相仿的少女,从她们心灵的悸动,到面对自我成长的懵懂与对他人经验的蒙昧,以及由此造成的

与周围人关系的疏远和心理困扰,沈从文对此类基于生命的时间本质而来的心理体验与生命经验描写在两个小说文本中非常相似。

但是,《边城》之所以能够比《三三》更富于象征性,以至于能够作为“过去农村”的典范,实在于它是对传统湘西社区生活中伦理关系的经验展开。《三三》与《边城》虽然都是少女成长故事的叙事架构,但是前者所指向的主要是主体心理经验的呈现,至于那个影响到少女三三心理微妙变化的“城里先生”,他的来历或近况、以及与三三所在地方生活的关系,小说叙事中都未仔细提及;而后者则在翠翠生命成长与微妙心理经验展开中,还通过对茶峒地方社会型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描绘,为人物活动提供一幅细致而恢宏的“经验景片”。翠翠的故事也只有镶嵌于这一“经验景片”中才能获取它的象征意义:所谓“常”与“变”的错综所成就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它能够让关心这片土地历史的人知道“过去农村”是什么样子。这里的“常”是湘西社区上百年来而形成的“生活之常”,“变”则是指内在于每一生命个体的“时间之变”。“边城”之所以能够成为“过去农村”的典范,正在于小说人物所置身的世界自有其社区生活领袖与社会组织型构,“边城”并非抽离社会伦理关系的牧歌世界或人性乌托邦。这个世界有其悲剧性,因为没有人能够逃脱时间之“变”,但是这种本质性悲剧显然有别于“现代乡村”的历史性悲剧。据此,沈从文建立了他的历史批判的思想基点。

湘西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且相当独特的社区,它的传统共同体生活留给后世的经验既是道德性的,更是政治性的。在这个“过去农村”里,人民生活四时交替,构成一种恒常不变的日常存在;而船总顺顺式的人物,他们虽买田置地,成为一方富户,却都保持勤俭本色,且因见多识广,为人忠厚热诚,得到一方乡人崇慕和信赖,成为社区生活的“中心人物”——当然,他们的组织力与影响力不仅来自其财产的支持,同时也缘于品德上的保证,使其得以摆脱个体生存必需性的束缚,从而进入一种有别于只为满足个体生存与家族延续为目的的生活,所谓社区生活的共同事务领域——按照四时节律,承办迎神、送神仪式,主持招待来往过客,抚恤孤寡老少贫弱——由此形成传统社区生活的“神—人”权力谱系。面对风雨交替的自然性的残酷,社区邻里守望相助,一切无不靠经验,一切又无不靠信神,社区伦理关系呈现为各安其分、而又生机勃勃的有机状态。但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传统社区的自主性与自足性都被打破了,湘西已然处在一个敞开的现代世界中。把翠翠的成长故事置于传统社区的经验景片上,沈从文想让我们看到的恰恰就是它所面临的变化。以这个“过去”与“当前”相对照,《边城》及其之后伦理图景的描绘,显然具有自觉而强烈的历史批判意味。

二、传统社区生活道德典范的失落

在《边城》之后,沈从文的湘西书写几乎都是在历史性的“经验景片”上展开人物活动。如此,那种独属故事的魔力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个个传奇解体之后的湘西“历史形象”——它的人伦关系、社会型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处于现代性的碰撞与断裂趋势中;见之于人物心理与行为,是沈从文对湘西昔日社区领袖与道德典范的描写。在《张大相》、《贵生》、《顾问官》、《王谢子弟》、《小岩》中,沈从文带着轻微嘲弄描绘了一类无能而堕落的人,他们已经失却其单纯、正直、高尚与伟大。从这些人物所属的社会阶层来看,他们或是当地税关首脑,或是寄食军队的前清秀才,或是拥有土财的一方富户。这些乡镇的大小士绅是国家政权的最基层部分。他们理应组织地方生活、承担其社会职能,同时也应负责教化事务。但是无一例外,这些昔日社区生活领袖已失去他们的组织能力与道德示范作用。

沈从文把湘西士绅阶层的衰落看作是湘西社区生活解体的表征,但是并不认为它的衰落是由于道德教条的僵化腐蚀了人伦关系,仿佛鲁迅在其乡村书写中所批判的那样。五四以来,对于传统社会典范失落的书写不在少数。鲁迅笔下原本属于传统“四民社会”领袖的士绅群体成为最应该被历史超越的一群人。传统经院知识使得他们中的一类如孔乙己之流已经完全丧失创生能力,他们堕落到社会下层,成为“站着喝酒而唯一穿长衫的人”;而与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相伴生的是传统士绅道德的解体,孔乙己最终沦落为小偷与乞丐。另一类虽然处于社会的上层,但无论是赵太爷钱太爷抑或是象征化的古久先生,作为传统社会的“规训者”与“惩罚者”,鲁迅凸显的均是其压抑性与剥夺性的一面——传统封建政体的道德基础已经丧失其合法性。这一类士绅形象,无一例外都是刻薄寡恩自私虚伪的人。在鲁迅看来,传统社会是一个必须也必然会被超越的社会,因为它的政治秩序的伦理基础就是堕落的、“吃人”的、反道德的。

鲁迅对中国历史进行了高度本质化的抽象,将其概括为“吃人”的历史,而将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描述为彼此吞噬的。相反,沈从文在描写堕落的士绅子弟时,始终瞩目他们身上传统道德性遗存——一种符合道德的行为表征,端的有赖于持久的文明教化,比如《贵生》中的五爷。他绝不是鲁迅笔下刻薄寡恩的赵钱太爷之流可比,他与贵生的关系虽然是雇主与佣工,但是他的行为态度依然有着传统道德的遗留。所以,当贵生来拜访时,他会礼节性地回馈食品衣物。五爷之迎娶金凤,也并非予取予夺的乡村劣绅所上演的强抢民女情节。但是,在人物看似符合道德的微妙行事态度中,这个五爷又倚仗财富而炫耀财富、挥霍财富,是沈从文着力描绘的乡村“新

式时髦人物”。《王谢子弟》中的四爷与《张大相》中的傻少爷也都是时髦、挥霍而虚浮无能的“新式时髦人物”典型,但是也都有着善良、天真、甚至不乏可爱、自作多情的品性。即便是《长河》中那个作为外来政治强力表征的保安队长,上过新式军校,自诩文明人物,知道所有时髦浅薄玩意,即便他贪财好色,背着人调戏天天,覬觎橘子园的大丰收,当着人时“面子上”却也不得不端庄严肃。虽然我们可以称之“伪君子”,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道德对人类品性具有规范性作用,人们正是据此“去辨别是非,判断或证明别人和他们自己的合法性”(阿伦特,“责任与判断”40)。在沈从文看来,传统“道德”并不“吃人”,相反它是维系基本的人伦秩序的观念基础。

但是,需要追问的是,如果并非如鲁迅所批判的那样是传统道德的非人性本质产生了自我腐蚀,为什么传统道德秩序还是丧失其自明而强大的约束力与规范作用?为了获得对此变化的理解,沈从文深入到湘西社区生活所经历的历史性变化之中。他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堕落的士绅子弟既是湘西社区生活变化的表征,同时也是这一变化的结果。在沈从文看来,造成湘西道德解体与典范失效的根本原因并非由于“传统道德”的“吃人”本质,而在于“二十年内战”的破坏性影响,以及现代商业文明与现代政争的腐蚀,才形成上述虚浮、时髦、贪婪、畏怯、无能的现代角色。

从湘西近现代历史可以看到,作为民国时期南北军阀角逐的中心战场,军阀混战为害,湖南地方甚重。为了地方利益,在“联省自治”运动背景下,湖南地方军阀赵恒惕展开一系列军政改革,推进省宪修订,同时希望能够整合湖南省内各支军事力量,推动一种美国式的联邦形式,并在宪政基础上谋求湖南地方的自治与发展(何文辉60)。这一谋求“联省自治”的地方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更高层面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过程。国民政府对地方从省到县的垂直管理虽然并不深入有力,但是“北伐”之后大体架构了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形式。然而,湘西地方由于历史原因,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都有其相对独立性,以致形成一片具有独立权力谱系的独特社区。于是,从省上升到国家,再回落到湘西的一个社区,其间错综的中央、(省)地方与(湘西)传统社区之间的势力纠结,真正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丰富而复杂的戏码。虽然有赵恒惕式的(省)地方宪政实践与联邦制构想,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府权力构建与民族国家诉求,但是“北伐”之后军人政治与暴力文化之恶性却成普遍化趋势(方德万126-81)。在彼时政治竞争中,各方势力皆拥兵自重,为筹措军费扩大势力,不惜养毒贩毒,控制地方,勒索百姓,由此养成恶疾。具体到湘西现实,是国家政治强力、省属政治强力与地方权力关系的竞争,以及与此权力冲突过程伴生的军人政治以及鸦片贸易,它们共同腐蚀了湘西传统社区生活的伦理秩序与道德基础。

伴随(省)地方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双重变革过程,湘西地区原有的社会型构与权力关系处在非常特殊的情势中。为削除省内地方武装力量,“湘西王”陈渠珍被其时省主席何健所迫下野,而由省上在湘西地方派驻保安队,以维持地方治安。但是,为了避免保安队久驻生根,形成新的地方军事势力,省上不时调防、移换地方军队与首领,以致造成官、兵、地方之间都互不熟悉。作为“外边人”,军队对地方不再具有桑梓感情,反而成为一股独特势力,代替过去的乡村精英,成为传统社区生活中一支不可控的力量(沈从文,“长河”100-01)。与此同时,还有民族国家层面的党派权力竞争,以及国家权力与(省)地方权力向社区基层的渗透。于是,为了筹措巨大的费用开支,这些军队或以剿匪为名就食于当地,如从《失业》侧面所见;或则勒索地方头面人物,如《长河》中先后从湘西过境的中央军、共产党,以及此后盘踞当地的外来势力保安队长;《小砦》中,则是税关局长参与到对地方剥削中。《边城》之后,传统社区有机的共同体生活趋于解体,地方传统权力关系由于外来政治强力的介入而处于崩溃与断裂之中。在《长河》与《雪晴》系列小说中,沈从文对上述变化进行了深入而细微的历史叙写。

三、《长河》与传统社区权力关系的新变

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自觉的历史意识导致其小说文本结构方式的变化。《边城》依然有一个传奇故事般的开头,“某某地方,有一个某某人[……]”。那么,文本就直接确立了一个对“现代时空”锁闭的故事架构。此后第二章中的景片描绘,才有意识地为人物活动提供一幅生动有机的伦理背景,或者说把人物活动镶嵌于此种伦理图景中。在叙事要素等级上,人物的生活故事是第一重要的。但是,到了《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叙述者没有再刻意营造传奇故事的魔力氛围;相反,小说一开始的景片描绘就显现了一个开放性的文本空间。它有明确的时间认定,故事发生在“1936年”,它的“经验景片”确实也是一个涵纳当前经验于其内的开放性的历史时空——恰如作者自己指出的,《长河》的“经验景片”描绘的是“居住在辰河两岸人民近三十年来的大略情况”。于是,我们看到“世界在变”,“受社会潮流影响”,历史上经千百年而不变的生活形式突然有了新的多端变化,传奇故事的叙事焦点——核心人物的生活故事被由核心事件叙述穿插交织而成的地区总体生活画卷所取代。

虽然《边城》的人物故事已经在一种伦理性的“经验景片”中展开,但是那种自在而自为的生存状态却是以翠翠为叙事圆心进行呈现的;至于以河街世界为表征的地区总体生活方式,以船总顺顺为圆心的社区权力关系构成,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秩序,则是作为人物活动的“经验景片”一带而过。但是,到了《长河》中,我们就可以看

到,《边城》未曾展开的湘西社区生活及其权力关系得到全面而深入的叙写。《长河》中,我们眼见的不仅有萝卜溪员外、橘园老板滕长顺为圆心的乡村生活,也有与之密切关联的以吕家坪商会会长为圆心的辰河口岸市镇生活;而橘园老板滕长顺与商会会长的干亲关系,则让我们看到,辰河中部小口岸吕家坪,从市镇到乡村,存在一个彼此联属相关的“社会上层”,也就是包含从村绅到镇绅这种不同层级变化的社区生活核心。这个士绅群体从乡村到乡镇,担负着组织地方事务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功能。而对于乡村小儿女的描绘,沈从文也不再倾注于与成长有关的内在细微心理经验的捕捉;相反,夭夭是作为历史叙事的焦点之一,聚焦外来政治强力对湘西既有生活秩序与生存状态的威胁。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社会历史意识的心理观察家,沈从文在《长河》中关注现代性在湘西所带来的心理惊奇与观念变化,比如“新生活”运动内涵的现代卫生与秩序观念给“乡下人”造成的心理震惊与观念眩惑,县里新式机器榨油方式给“乡下人”带来的不可思议与深刻怀疑——“乡下人”不懂“城里人”;但是,沈从文也细致呈现传统与现代冲突的另一面,那就是“现代”对“传统”社区经验的疏离与不解,见之于日常生活事件,是“外边人”买橘子时不解“乡下人”的好客与热情,误把好意馈赠当作轻慢,以致一边是“乡下人”请“外边人”吃橘子,一边是“外边人”恼怒、误解、强买。然而,恰恰是在这样彼此“不懂”之中,“乡下人”经由口耳相传、作为《申报》潜在读者而被构建起统一的抗日意识与国族情感,桑梓之情浑融入国族意识,这于传统湘西社区人民是新颖的现代经验,而此经验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以及国家与地方权力冲突中面临更为复杂的状况。《长河》中,沈从文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你们本地老总”不怕(省)主席怕中央,不怕人怕法,怕军法和国法,怕和委员长为难。但是,恰恰是这一国族认同与国族情感在战争中遭遇考验,沈从文三弟沈荃率领的湘西部队被调至战争最艰巨的嘉善防线,以致死伤殆尽,并在回乡休整后不久就再次补充新兵重上前线,湘西人的国族情感与负责精神战胜传统中国历来的地方自保意识,但是并不意味着沈从文与湘西地方力量对于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力量的机心没有洞察与批判(沈从文,“芸庐纪事”233-45)。

在《长河》中,确实可以看到沈从文更为倾注的现象是,随着国家权力与省权力对地方生活的渗入,湘西地区生活与权力关系遭遇破坏性影响。外来政治强力介入湘西地区生活,与湘西地方权力形成竞争而错综的复杂关系。在此需要指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湘西地方权力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强力或暴力,而是产生于社区中人们的共同生活,“是从一块行动的人们中间生发出的力量”(阿伦特,“人的境况”157)。这个权力,从其产生的“共同生活”前提来看,它指向的始终是与共同体生活相

关的公共事务,而要以参与者的言说与行动为表现(阿伦特,“人的境况”157)。而这一“公共事务”指向的始终是一个“日常时刻”,按照四时交替,举行酬神祭神仪式,排解竞争纠纷,筹办来往招待,以此形成的“神—人”权力谱系都是与“共同体”总体性生存有关的日常活动。湘西传统社区生活中的权力关系显然有别于中国进入现代历史时期以后不断趋向“非常时刻”的现代政治运作——以强力、暴力为表征的专制统治与权力竞争。如果说共产党、中央军过境,还只是暂时性的物质剥夺,对湘西传统权力结构形成本质破坏的则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渗入,如前文所及——保安队长作为外来政治力量的表征,已然成为地方上一支异己势力,威胁到地方百姓生活,对橘园老板滕长顺的财产与儿女都是潜在的剥夺者。《长河》所涵纳的已经是一个传统“日常时刻”与现代“非常时刻”交织构建的开放性时空。那么,它所指向的湘西社区“未来”将会是怎样的?

沈从文并非一个地方主义者,他有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他数次表明,由湘西可以检视中国面临的普遍问题。沈从文的湘西经验使他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权力竞争与政治运作提出深刻批评,认为它们违背了“政治”的初衷,只是党派纷争或政治宣传与商业竞买的结合,从而也就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领域相互排斥。对湘西人而言,如果以媒介、新生活运动为表征的现代性迫使湘西被纳入一个现代心理与观念时空,那么还有一重更为深刻而隐微的社会建制层面的现代性经验,那是以中央军、共产党、保安队长为表征的外来强力对湘西传统社区生活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渗入。湘西,一个原本依据自然法与习惯法进行治理的社区,现在被带入一个不可逆转的现代进程中,它面临的将是一个“传奇时代”的结束。

四、《雪晴》系列与传统社区关系的断裂及传奇时代的结束

《雪晴》系列完成于1945—1947年之间,包含四篇互有关联的小说:《赤魔》、《雪晴》、《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这四个短篇构成一个完整的小中篇,叙事者是刚刚年满十八岁的“我”。这个“我”行伍出身,押送过乡下老实人去城外法办,也乐于护卫长官到乡绅家里得到丰盛款待,更享受用杀人时血淋淋大刀随意切割屠户牛羊肉的快乐,但同时又怀抱着“画家梦”。机缘巧合,“我”由士兵成为“司书”,被派遣回乡。于是,受四个相熟学生邀请,去到一个名“高枳”的地方。一路上,雪后清奇景物与那份静寂中生命的欢欣律动及挣扎,都给“我”留下强烈却无法描摹呈现的印象。于是,做画家的美梦只好永远放弃,“我”意识到自己活在一个“现代传奇”中。此后,叙事在“我”的主体经验和“高枳”地方人物事件的交错叙述中进行。“我”做客的满家大院正在举行一场流注着乡村

式欢乐的婚礼,乡村自然看似永恒的冬日寂静与婚礼中的生命辉煌、红花青春及雪白银发相对照,一切印象仿佛“紫茸茸金黄镶边的葵花”,“华丽,鲜明,难把握,不停顿!”在这种氛围中,“我”亦被照顾“我”起居的十七岁乡下姑娘所迷惑,“我”沉迷于“现代传奇”氛围里。“我”的理性迷乱,“我”需要抵抗“传奇”或者“乡村抒情诗”——那个秀美单纯的少女的诱惑。

《赤魔》和《雪晴》,主体“我”的自我剖析似乎让人看到沈从文擅长的主题:微妙的主体心理世界,乡村抒情诗氛围中的爱欲招引与成长蜕变——也就是那个湘西的传奇式书写。但是,传奇故事却在《雪晴》结尾被打破,而“我”也在经历智性的拓展。“我”抵制内心爱欲的浪漫诱引,以“喜欢单独”为由,搬离满家大院,寄居到村外一处小楼上。在孤立中,“我”得到十八岁的年纪应该得到的一切:冷静的旁观与思索,从他人的故事中获具人生经验与成长的智慧。于是,到《巧秀与冬生》和《传奇不奇》,那种倾向于主体自我内心的抒情性叙事被倾向于外部世界的历史性叙事所取代。围绕巧秀与“棉寨”吹喇叭人的私奔事件,少女巧秀的身世与来历,巧秀母亲的私情与死亡,满家在“高枳”地方上的位置,“高枳”地方的乡村伦理关系状况,“高枳”地方生活与县政权的关系等等,在小说叙事中都得到细致而深入的历史叙写。而这最终所呈现的是:在处置乡村情爱纠纷与宗族关系时,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在于——巧秀母亲的私情故事还只是由于族长贪婪与变态所造成的个体性的悲剧,而巧秀的私奔事件却由于外来县政权政治强力的介入,以及地方上“现代”裂变所形成的宗族对立,共同造成乡村传统人伦与权力关系的断裂,它的悲剧不仅是个体性的,更是群体性、历史性的。

《雪晴》系列小说呈现了沈从文深刻的历史忧患,以致“隐身作者”迫不及待现身,取代叙述者“我”的主体位置,以一种民族国家层面的政治关切代替乡村地方生活故事的叙述,如文中所见:

但近二十年社会既长在变动,二十年内战自残自戕的割据局面,分解了农村社会本来的一切。影响到这小地方,也自然明白易见。乡村游侠情绪和某种社会现实知识一接触,使得这个不足三百户人家村子里,多有三五十支杂色枪,和十来个退伍在役的连排长,以及二三更高级更复杂些的人物。这些人多近于崭新的一阶级,即求生存已脱离手足勤劳方式,而近于一个寄食者。有家有产的可能成为“土豪”,无根无柢的又可能转为“土匪”,而两者又必有共同的趋势,即越来越与人民土地隔绝,却学会了世故与残忍。尤其是一些人学得了玩武器的技艺,干大事业又无雄心和机会,回转家乡当然就只能作点不费本钱的买卖,且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中,产生一套现实哲

学。这体系虽不曾有人加以文字叙述，事实上却为极多数会玩那个愚而无知的人物所采用。永远有个“不得已”作借口，于是绑票种烟都成为不得已。会合了各种不得已而作成的堕落，便形成了后来不详局面的扩大继续。但是在当时那类乡村中，却激发了另外一方面的自卫本能，即大户人家的对于保全财富进一步的技能。一面送子偕入军校，一面即集款购枪，保家保乡土，事实上也即是保护个人的特别权益。两者之间当然也就有了斗争，有流血事继续发生，而结缘影响到累世。这二十年一种农村分解形式，亦正如大社会在分解中情形一样，许多问题本若完全对立，却到处又有个矛盾的调合，在某种情形中，还可望取得一时的平衡。一守固定的土地，和大庄院，油坊或榨坊糟坊，一上山落草；共同却用个“家边人”名词，减少了对立与摩擦，各行其是，而各得所需。这事看来离奇又十分平常，为的是整个社会的矛盾的发展与存在，即与这部分的情形完全一致。国家重造的设计，照例多疏忽了对于这个现实的爬梳分析的过程，结果是一例转入悲剧，促成战争。（“巧秀与冬生”425—26；Vol. 10.）

在这个“隐身作者”看来，“高视”这个小地方原本是上述中国现实经验中的一个特例。因为地处偏远，地方又小，“高视”地方特权者的对立乃常常因为“利益平分”而消失。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不该发生惨剧的地方，却因为巧秀的私奔出逃和押送烟土的冬生被劫持而造成田、满两族的厮杀伤亡。而这一切，都源于满家主事人满大队长没有按照乡村习惯法进行“私和”，派人接洽商量数目，把人货赎出，而是逞强使气、禀报县里“剿匪”。虽然满老太太忠告儿子，“你万千小心，不要出事！你不比县官，天大的祸事都惹得起。你是本地人，背贴着土，你爷爷老子坟都埋在这里，不能做错事！”但由于“外边人”——官府权力的介入，原本已准备作罢的满大队长却骑虎难下。惨剧酿成，中国传统乡村的解体已经势所难免，“家边人”的桑梓情感已不再足以维系崩溃中的乡村伦理联系——一个传奇时代过去了，这正是小说最后归结为“传奇不奇”的主旨所在。

结 语

虽然研究者探讨沈从文湘西书写的现代性转变，注意到现代传媒在湘西构筑起现代心理与观念时空，与地区传统生活时空形成犄角竞争之复杂形势，以及《边城》前后“湘西书写”在文本结构与叙事话语形态方面发生的变化，但是研究者同时又把写作者的这一转向归结为传统说故事人走向死亡、一个有许多故事的乡下人在现代大学体制中蜕变为孤独的现代个体的象征性过程，似乎

沈从文只是一个叙事经验耗竭、从而沉入孤独内心的文本主义者（吴晓东83）。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边城》及其之后“湘西书写”由传奇性向历史性的经验展开的转化，就会看到——思想成熟期的沈从文，他的写作是和他的现实政治反思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叙事转向所昭示的伦理关切恰恰是30年代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话语表征。具体到《边城》及其之后《长河》与《雪晴》系列小说的写作，是1934年初的湘西之行给予沈从文的新经验：阔别家乡十数年，眼见湘西传统社区生活的破碎与权力关系的断裂已在所难免，而它所造成的道德解体已是显明的事实——一向作为沈从文理想之道德范本的“边城”正处在崩溃过程中。虽然湘西书写中现代文明批判的心理、观念构建主题还在，但是因为触及到地区生活和权力关系变化的经验深层，《边城》及其之后，“湘西书写”的伦理指向显然和沈从文的现实关切相联系：那就是湘西将向何处去？中国将向何处去？至于沈从文所给出的“国家重造”、“民族品德重造”路径，笔者将另文撰述。

从《边城》到《长河》、以及《雪晴》系列小说，湘西地区古老的社区生活趋于崩溃。那种在古老社区生活中形成的权力关系，所指向的是与共同体生活相关的日常事务，以及基于自主权的社区共同事务领域。然而，在面向现代的历史展开过程中，政治强力和政治暴力所指向的却是与党派意识形态竞争、集团利益争夺有关的“非常时刻”，其权力之运作恰恰侵蚀、败坏、剥夺了基于社区的共同事务领域而形成的权力关系。引入湘西地区古老的社区生活经验作为对照，并不意味着沈从文是一个倾向过去的保守主义者。相反，他从湘西独特的社区生活经验获得对政治本质的原初理解，恰如阿伦特在追寻希腊城邦经验时所获得的。沈从文在谈及湘西传统社区生活时，确实突出作为一个社区的“湘西”的共同体特征——在那里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上层”，接近于希腊城邦中的自由民阶层，主要由获具军功的军人和保有财产的士绅构成，使他们能够摆脱生存必需性的束缚而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去，并在共同行动中形成交错深入的权力关系。这个“权力”源于人们的共同行动，而且是通过言说（彼此交谈）得以现实化。这是绝大部分现代中国作家基于启蒙知识分子立场而忽视的传统社区政治生活经验，他们倾向于把传统乡村本质化，作为一只道德容器，提取各自所需要的批判或意义。而沈从文却在《边城》及其之后的“湘西书写”中经历一种历史性的变迁，形成自己政治反思的立足点。沈从文对现代政治运作的功能性、与暴力化予以深刻否定，并非由于他是浪漫化的乡村骑士或曰保守的地方主义者，而是基于传统湘西社区生活独特的政治经验和对权力的理解，“绝对的、无可争议的统治，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领域是相互排斥的”（阿伦特，“人的境况”17）。

研究者探讨现代艺术对市民社会的贡献时,引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谈到公共领域的最初形式,在它政治化之前,具有显而易见的文学性质,这表现为作家、出版社、书店和阅览室数量的大幅增加,以及数不清的咖啡馆、沙龙和家庭聚会(周宪 78)。从沈从文的个人经验来看,1930年代初到1940年代末期,他正是以作者身份深刻介入时代议题,并且以副刊编者身份集纳起一个具有大致接近的政治倾向与文化倾向的公共话语空间。《边城》及其之后,沈从文的伦理关切指向道德秩序与人伦关系重建,在彼时从中日战争到国共政争充满暴力与强迫的历史语境中,试图把湘西从冲突与毁坏中拯救出来。正是在此层面上,沈从文的思考与写作最切近政治生活的原初涵义:政治并非社会的某种功能,而是一种作为公民在其私人生活之外所获具的、为其自由存在提供价值与意义的公共生活。须知,“真正的政治行动(就其处于暴力领域之外而言),要以言说来进行,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除了言说传达或交流的信息外,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阿伦特,“人的境况”1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Trans. Wang Yinli. Shanghai: Century Publication Group, 2009.]

——:“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

[———. “Problems of Moral Philosophy.”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Trans. Chen Lianying. Shanghai: Century Publication Group, 2011.]

方德万:《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胡允桓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de Ven, Hans va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Trans. Hu Yunhu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House, 2007.]

何文辉:《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He, Wenhui. *The Memory at a Historical Turning-point: The Move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utonomy in Hu'nan in 1920s*.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Qian, Duansheng.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nghai: Century Publication Group, 2008.]

沈从文:“长河”,《沈从文全集》(10)。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Shen, Congwen. “Long River.”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en Congwen*. Vol. 10.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2.]

——:“巧秀与冬生”,《沈从文全集》(10)。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 “Qiaoxiu and Dongshe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en Congwen*. Vol. 10.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2.]

——:“芸庐纪事”,《沈从文全集》(10)。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 “Yunlu Chronicles.”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en Congwen*. Vol. 10.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2.]

吴晓东:“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长沙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版》2(2011):82-89。

[Wu, Xiaodong. “From ‘Story’ to ‘Novel’: Shen Congwen's Narrativ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2011): 82-89.]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Zhou, Xian. *A Critique of the Aesthetic Modernis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责任编辑:王 峰)